

清華簡《繫年》「二王並立」與《春秋》「始隱」再探 §

甯登國*

摘要

清華簡《繫年》的公佈，為從源頭解開《春秋》「始隱」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出土文獻資料和新的視角。《繫年》「周亡王」一詞，既是對西周最後一位荒淫誤國、殘暴無道的天子——周幽王的貶稱，也是對幽王之後霸權迭興、天下無王政治局面的精當概括；《繫年》所載「二王並立」的史實，開啟了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分化爭權的混亂狀態。二者在魯隱公時期縱橫交織，時空相匯，形成突出的歷史轉捩點。《春秋》始隱開篇，一則有志於撥「天下無王」之亂，一則旨在彰顯隱公攝位之誠，禮讓之舉，改過之德，返王道之正。

關鍵詞

《繫年》 「周亡王」 二王並立 始隱

儒家慎始。經書開篇，往往大都寓意深遠，統攝全篇，如《詩》之〈關雎〉、《書》之〈堯典〉、《易》之〈乾〉〈坤〉。至於《春秋》為何自魯隱公始，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較有代表性的有「史之初載」說¹、「受命於魯」說²、「為後王法」說³、

§ 本論文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訂補」研究計劃部份成果，該計劃得到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資助（編號：UGC/FDS22/H01/17），謹此致謝。

* 甯登國教授，山東聊城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 1 《公羊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見黃銘、曾亦譯注：《春秋公羊傳》（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771。
- 2 漢人何休《公羊傳解詁》說：「《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見【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十三經注疏·公羊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195。
- 3 「始於隱公者，以為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徐化，苟有過惡，當以王法正之。及代變風移，陵遲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可誅，無復善惡。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為

「譏王之不王」說⁴、「始隱而意在三桓」說⁵、「維護嫡庶宗法制」說⁶等。2011年，清華簡《繫年》的公佈，為從源頭解開這一謎題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和新的視角。利用這一出土文獻，白國紅、劉國忠合撰〈春秋始於隱公新解〉一文，認為春秋始於隱公，緣於「對平王之立的態度有一個從否認到無奈認可的轉變」，「有為平王正名的責任」⁷。筆者對這一結論不敢苟同，恰恰相反，《春秋》始隱，實是源於西周末期「二王並立」開啟春秋各國亂局，而平王微弱，無力回天，孔子乃撥亂反正，筆削《春秋》，以當王法。茲不揣淺陋，略作陳論，就教方家。

（一）《繫年》「二王並立」與「周亡王」辨析

對於平王東遷前後曾存在較長時期「二王並立」的分裂局面，傳世文獻鮮有記載。但隨著出土文獻的陸續面世，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已愈發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如《汲冢書紀年》：「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天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餘臣於攜。周二王並立。」⁸明確地提出幽王被弑後，申地宜臼與攜地王子餘臣政權並峙，形成「二王並立」的政治局面。尤其是清華簡《繫年》的詳細記載，再一次確證了這一史實：「周幽王取妻於西申，生平王。王或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盤。褒姒嬖於王，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圍平王於西申，申人弗界，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餘臣於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

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禮之失也。」【唐】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春秋宗指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4 陳澧《東塾讀書記》：「其始於隱桓何也？春秋之前，魯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禦，弑懿公而自立；春秋不始於彼者，周宣王伐魯殺伯禦而立孝公；是時天子尚能治亂賊也。至隱公為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則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見陳澧：《東塾讀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152。
- 5 王樹民說：「魯國的歷史，在孔子的時代，三桓的勢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季孫、叔孫、孟孫三家都出自桓公，而桓公是與其兄隱公爭位，殺了隱公才得為魯君的。所以從隱公開始，既能說明三桓的由來，也正是魯國的近現代史的開端。」見王樹民：《〈春秋經〉何以托始於魯隱公》，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1期。
- 6 楊普魯說：「《春秋》始自隱公所取之『義』就是要通過魯隱公的行為及其遭遇來維護立嫡不立庶這個宗法制中最核心的繼承原則。」見楊普魯：《〈春秋〉何以始自隱公新解》，《西北師大學報》，1995年2期。
- 7 白國紅、劉國忠合撰：〈春秋始於隱公新解〉，《中國史研究》，2011年4期。
- 8 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63-64。

王於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於周，晉文侯乃逆平王於少鄂，立之於京師。三年，乃東徙，止於成周，晉人焉始啟於京師。」⁹與上引《汲冢書紀年》相參證，這裏可以更加明確「二王並立」的史實：先是幽王與「天王」宜臼並立，一度引發幽王圍打宜臼；幽王死後，攜惠王餘臣與「天王」宜臼並立，直至「廿又一年」（前 750）攜惠王被殺。

關於「二王並立」過程的具體分析，時賢討論已很充分¹⁰，茲不贅述。下面僅就《繫年》中與《春秋》「始隱」關係密切的「周亡王九年」問題略述己見。

目前，關於「周亡王九年」的解釋不一，主要有三種說法：「幽王九年」說、「幽王滅後九年」說、「攜王滅後九年」說¹¹。其中，「周幽王九年」說因與《繫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於周』相聯繫，並且與傳世文獻相契合」¹²，更為合理。筆者贊同此說。在此基礎上，對「亡王」之稱的內涵作進一步討論。

《國語·周語下》：「此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也。」對於其中的「亡王」，韋昭注云：「共工侵陵諸侯以自王，皆無道而亡。」¹³鑒於周幽王在位十一年任用佞臣、獨斷專行、窮奢極欲等種種無道行徑，簡文「亡王」一詞，也是對周幽王之後周王朝王道衰微、「王而不王」政治形態的總體概括。一方面，從當時情勢來講，「天下無王」指幽王死後餘臣與宜臼長達二十一年（前 771–前 750）的「二王並立」時期君不君、臣不臣的無序亂世狀態。雙方你爭我奪，彼此混戰，國內陷入群龍無首、莫定一尊的混亂局面。以宜臼為首的西申政權，雖然自封「天王」，但因其太子身份已被廢黜，加之其支持力量主要是非姬姓的申侯、繒侯、許公及犬戎部族¹⁴，因此是一個非正統的合法政府。清華簡《繫年》「幽王起師，回（圍）平王於西申，申人弗畀」一語，表明在宜臼宣佈獨立以後，曾遭朝廷正規軍大肆剿殺。對於

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版），頁 138。本文所引皆採用通行釋文。

10 如晁福林：〈論平王東遷〉，《歷史研究》，1991 年第 6 期；王紅亮：〈清華簡《繫年》中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年代考〉，《史學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程平山：〈兩周之際「二王並立」歷史再解讀〉，《歷史研究》，2015 年第 6 期。

11 參考王偉：〈清華簡《繫年》「周亡王九年」及其相關問題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5 年第 6 期。

12 王紅亮：〈清華簡《繫年》中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年代考〉，《史學史研究》，2012 年 4 期。

13 徐元誥撰：《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97。

14 《國語》韋昭注：「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也。」未指出具體所在。韋昭還說：「鄭，姒姓，禹後也。鄭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故申、鄩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見徐元誥：《國語集解》，頁 251。

攜惠王，清華簡《繫年》「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餘臣於虢，是攜惠王」一句，明確了攜惠王餘臣的身份非杜預注所謂「幽王少子伯服」¹⁵，也非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所言「幽王之庶子」¹⁶，而是幽王之弟。「攜惠王」之稱謂，可說是對餘臣歷史地位的一種最終定性，即「惠王」是餘臣的支持者給他所定的諡號，而「攜惠王」則是其反對方平王一系對餘臣的貶稱。因「攜」在這裡取「離心」「貳」之意，即對餘臣一系正統地位的否定。《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說攜王僭號篡權被諸侯廢黜，正是這一對正統地位否定性稱謂的延續。正如李學勤先生所言：「『周亡王九年』還應是『周無王九年』，這是由於宜臼在申，餘臣在虢，都不在王都，也都未能得到普遍承認。」¹⁷

另一方面，從幽王之後歷史發展的長遠趨勢看，「周亡王」亦是對春秋時期王道衰微、霸權迭興政治局面的精當概括。《穀梁傳·桓公元年》解釋「桓無王」一詞說：「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¹⁸其實，類似桓公這種亂臣賊子而周王又無力懲治的現象，在春秋時期是極為普遍的。清人顧棟高對春秋時期政治發展的變遷過程有一段精彩論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莊、閔之世，伯事未興，諸侯無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荊楚交熾，賴齊桓出而後定，此世道之一變也；僖、文、宣、成之世，齊伯息而宋不競，荊楚復熾，賴晉文出而復定。襄、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迭勝迭負，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伯，幾秩桓、文，然實開大夫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衛孫寧交政，中國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為戰國矣。」¹⁹顧氏高屋建瓴，鳥瞰春秋，審論精闢。歷史進入春秋時期，齊僖、鄭莊「小霸」，諸侯征伐會盟不斷，繻葛一戰，射王中肩，王風掃地，開啟諸侯爭霸的序幕；自齊桓公，歷晉文公、楚莊王直至晉悼公，霸權迭興，互有勝負，踐土之盟，以臣召君，王權式微；晉悼公之後，諸侯內亂，陪臣執政，吳越爭盟，王聲近寢。「會《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²⁰因此，一部春秋史，既是群雄逐鹿，霸權迭興的爭霸史，也是周王朝大廈傾頹、

15 【唐】杜預注，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114。

16 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頁422。

17 李學勤：〈由清華簡《繫年》論《文侯之命》〉，《揚州大學學報》，2013年2期。

18 【唐】楊士勳：《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372。

19 【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讀春秋偶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32。

20 【宋】呂大圭：《春秋五論·論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名存實亡的滄桑世變史。宋人孫復亦不無感慨地說：「吾觀隱、桓之際，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行之。其無王也甚矣！」²¹

對於春秋時期這種「有霸無王」的歷史現狀，驗之《繫年》史實，亦足以發覆。《繫年》共二十三章，有關周王朝的史實集中在前四章，提及武王克商、成王伐商蓋、厲王暴虐、宣王弗田、幽王之亡、平王東遷，「即使是這前四章，所說的重點也是在於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諸侯國怎樣代興」²²，隨後 19 章交錯運用楚、晉兩國紀元記述春秋至戰國初期各諸侯國征伐、爭霸、內亂等大事。至於東遷以後的王事，除第四章提及了「周惠王」之名僅作為紀年的標志外，無任何記載。而對於楚王世系自「楚文王以啟於漢陽」直至戰國前期的楚悼王，歷歷在目，有條不紊，與「周亡（無）王」形成鮮明對比。可見在《繫年》編者心目中，歷史發展的決定因素「在於國家、家族、個人實力強弱的變遷，以力繫事為其深層敘事結構」²³，而非王權的整頓與集中。

因此，《繫年》「周亡王」一詞，具有雙重內涵：一方面是對西周最後一位荒淫誤國、殘暴無道的周幽王的貶稱；另一方面，也是對幽王之後霸權迭興、天下無王政治局面的精當概括。正是鑒於春秋時期王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跡於世，孔子懼，作《春秋》，欲以明王道而垂後世，彰王化而治亂世。對於孔子因「天下無王」而作《春秋》之旨，自孟子首揭「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後，學者大多贊同此說。《穀梁傳》云：「平王東遷，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春秋》。」司馬遷《太史公自序》云：「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²⁴晉杜預云：「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宋人孫復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²⁵孫覺云：「《春秋》之作，以天下無王而王政不行也。故天下無王，則《春秋》書王以正之前；王政不行，則《春秋》微周以見其意。」²⁶呂祖

21 【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

22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 年 3 期。

23 李明麗：〈以力統禮——試論清華簡《繫年》的深層敘事結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6 年 3 期。

24 司馬遷：《史記·秦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349。

25 【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

26 【宋】孫覺：《春秋經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1。

謙云：「至於名為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²⁷ 不過，這裏的問題是，既然孔子傷嘆「天下無王」而作《春秋》，周室作為天下共主的威信，自周幽王時即已一落千丈，那麼，《春秋》何以不從幽王時期的魯孝公開始，卻要從平王之末的魯隱公開始呢？

（二）「二王並立」與春秋初年各諸侯國的仿效

根據清華簡《繫年》和《竹書紀年》記載，周末「二王並立」始自幽王八年（前 774）廢申后逐太子宜臼，直至攜王立二十一年（前 750）晉文侯殺攜王，立宜臼為周平王，才結束了長達 24 年的分裂動盪局面。但是攜王被殺，平王東山再起，贏得王位，並沒有帶來周王朝的繁榮和穩定。相反，上樑不正下樑歪，開啟於西周末年的這一分化爭權的混亂狀態，在春秋初年的各個諸侯國內猶如倒下的多米諾骨牌一樣，引起了連鎖反應，紛然淆亂，動盪組合，上演了一幕幕「二君並立」終至成王敗寇的殺伐事件，預示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風雲變幻時代。

（1）晉之「曲沃代冀」。西元前 745 年，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史稱曲沃桓叔。曲沃由此成為與晉都冀並立的第二個政治中心。以曲沃為中心的小宗與以都城冀為中心的大宗之間也由此展開了長期的連環奪權鬥爭。據《史記·晉世家》，較有代表性事件有：（一）前 739 年，曲沃桓叔攻殺晉昭侯；（二）前 724 年，曲沃莊伯弑孝侯；（三）前 718 年，曲沃莊伯攻打鄂侯，鄂侯奔隨邑；（四）前 709 年，曲沃武公攻殺晉哀侯；（五）前 705 年，曲沃武公誘殺晉小子侯；（六）前 678 年，曲沃武公攻殺晉侯緡。最終，「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更號曰晉武公」²⁸，標誌著曲沃一系最終取代都城冀一系。從曲沃桓叔初封曲沃，至曲沃武公代晉為諸侯，同宗相殘，相互仇殺，內戰長達 67 年，時間不可謂不長，鬥爭不可謂不曲折殘酷。

（2）鄭之「鄭伯克段」。《左傳》在追溯克段緣起時，一「初」字，就從克段時的魯隱公元年（前 722）追溯至鄭莊公出生之年（前 757），因「莊公寤生，遂惡之」，時間跨度達 35 年之久，表明武姜與鄭莊公母子之間不是一般的矛盾，簡直就是天生的冤家對頭。莊公即位後，從共叔段「都城過百雉」和「命西鄙北鄙貳於己」等種

27 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年）卷 11，頁 7。

28 司馬遷：《史記·晉世家》，頁 280。

種挑戰鄭莊公權威的行為中，可以看出此時的叔段已公然與鄭莊公分庭抗禮，形成實質上的二君對峙局面。對此，當時大臣公子呂早就看出二人水火不容的對峙態勢：「國不堪貳」「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左傳》編者則直接將這種態勢定性為「如二君」；杜預《春秋左傳注》中也說：「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僞傑，據大都以耦國」；²⁹[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則據「京城太叔」這一稱謂，感受到叔段「隆重尊嚴，威焰逼人之狀如見」。³⁰這一切都清晰地表明武公去世後，鄭莊公與共叔段之間圍繞君權爭立自始至終都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和鬥爭，直致最後釀成血腥的宮廷政變。2016年公佈的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記載武姜在鄭武公葬禮上規勸叔段「毋知邦正」，並非真的勸他遠離政治中心，而是在此政權交接不穩的關鍵時期，借鑒「三年諒闇」、不言政事的幕布，暗中重建權力網路，培植黨羽，爭取民意，以收「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³¹的政治效應，實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³²，有助於深入認識春秋初期鄭國這一長達三十多年明爭暗鬥的宮廷內訌。

(3) 衛之「州吁弑其君」：春秋初期，發生在衛莊公家族內部州吁和公子完（衛桓公）兄弟之間的內鬥與「鄭伯克段」極為類似。公子州吁，衛莊公「嬖人之子」，依恃寵愛與石厚等人相互勾結，醞釀謀逆篡弑。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前741年，「州吁好兵」；前733年，「弟州吁驕，桓黜之」；前719年，「州吁弑公自立」³³。州吁之亂前後亦達二十多年。

(4) 魯之「隱公被弑」：據《左傳》，從表面看，魯隱公被弑事件發生在隱公十一年（前712），為公子翬指使賊人所為，但「羽父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一語，表明公子翬弑隱公是得到桓公授意的，桓公實為弑君之主謀。隱、桓對立的根源來自隱公元年的嫡庶之分：隱、桓同為魯惠公之子，也同為惠公妾所生，但因桓公之母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桓「子以母貴」³⁴而為嫡子；隱雖年長而為庶子。鑒於隱公元年惠公薨時桓公幼弱，「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暫攝居位。

29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1714。

30 【日】竹添光鴻：《左氏會箋》，（四川：巴蜀書社，1982年），頁12。

3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坊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621。

32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2016年1期。

33 韓兆琦譯注：《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225-1228。

34 黃銘、曾亦譯注：《春秋公羊傳》，頁2。

如此，魯之隱桓兄弟之爭亦長達十一年之久。

(5) 宋之「殤公被弑」：宋殤公原為宋宣公之子。隱公三年（前 720），因宋穆公感恩哥哥宣公傳位於己，故亦立遺囑傳位宋殤公，而穆公之子公子馮則流亡鄭國。自此，宋殤公與鄭國支持的公子馮展開了長達十年的君位之爭。最終於西元前 711 年，宋華督弑殤公而迎立公子馮於鄭，是為宋莊公。

對春秋初期各諸侯國的亂象，《史記·楚世家》作了集中概括：「（楚）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³⁵這些弑君作亂事件，如上分析，均集中發生在魯隱公時期，而且都是圍繞爭奪君位所發生的親族相殘、你死我活的曠日持久內戰，是「二王並立」的翻版或縮影，成為禮樂崩壞的初始標誌事件。

（三）撥亂反正：《春秋》「始隱」大義

對於孔子修《春秋》之「義」，《春秋公羊傳》解釋說：「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³⁶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班固《漢書·司馬遷傳》也徵引這一觀點，表示贊同。因此，撥亂反正，非常精當地揭示了孔子編修《春秋》的真正用意。下面就「撥亂反正」這一關鍵詞語結合史實作一分析。

首先，對於「亂世」的界定，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對此，孔安國解釋說：「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³⁷這裡，孔安國細緻地劃分了兩個時間節點，對於我們認識《春秋》始隱問題很有啟發：他根據孔子判斷「天下有道」「無道」的主要標準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還是「自諸侯出」，認為平王東遷前後，雖然經歷一段「二王並立」、天下「亡王」階段，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這僅僅是周王朝「微弱」的開始，還不意味著禮樂征伐王權的喪失。至於真正步入紛爭無序的「天下無道」階段，實始自近半個世紀以後的魯隱公元年。因為這一方面與孔子本人所劃定的「十世希不失」的時間起點相

35 韓兆琦譯注：《史記》，頁 1225-1228。

36 黃銘、曾亦譯注：《春秋公羊傳》，頁 771。

37 【清】阮元校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季氏》（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2521。

吻合，「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³⁸，也就是說，自孔子所處的昭公時期，向前推十世，即為隱公時期；另一方面，上節所述各諸侯國紛紛仿效周王朝「二王並立」、專行征伐的歷史事實，也大都在隱公時期（前 722–前 712）集中爆發，如前 724 年，晉之曲沃莊伯弑晉孝侯；前 722 年，鄭伯弟段作亂；前 721 年，鄭伐衛，開春秋時代某諸侯征伐他國之先河；前 720 年，鄭侵天子田；前 719 年，衛聯合宋陳蔡伐鄭齊，開創了諸侯聯合伐某國的先例；前 718 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前 712 年，魯人弑其君隱公。孔子以《魯春秋》為綱修史，而這些標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無道」亂局均集中發生在隱公時期，因此《春秋》斷代自然始自隱公。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也說：「觀夫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之禮不修，貢賦之職不奉，號令之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國竊號者有之。征伐四出，蕩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遲，逮隱而死。夫生猶有可待也，死則何所為哉！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³⁹宋人蕭楚也說：「《春秋》書諸侯盟會侵伐，見天下大政自諸侯出，此《春秋》所以自隱公而始也。」⁴⁰

其次，「反之正」，意指尋求使亂世恢復正常秩序的良方。《論語·顏淵》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⁴¹孔子修《春秋》，不僅僅是揭露「邪說暴行」「善善惡惡」，使「亂臣賊子懼」，更重要的是究亂世之根源，覓治世之良方，使天下回歸正道。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⁴²太史公指出春秋亂世的根源在於「失其本」，在於定於一尊的王道衰微，在於維繫人倫綱紀的禮樂崩壞，故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⁴³孔子將隱公置於《春秋》第一公來寫，不僅僅著眼於隱公被弑，春秋亂世的大幕由此拉開，還有一層更深層面的意蘊，那就是張揚隱公禮讓精神，為亂世開局樹立一賢君標杆。對於隱公「禮讓」之德，「三傳」均表認同：《公羊傳》：「凡

38 程樹德撰：《論語集釋·季氏》（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33，頁1141。

39 【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

40 【宋】蕭楚：《春秋辨疑·盟會侵伐統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1 【清】阮元校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季氏》，頁2504。

42 韓兆琦譯注：《史記》，頁7664。

43 韓兆琦譯注：《史記》，頁7667。

隱之立，為桓立也」⁴⁴，明確表示隱公攝位，就是為了桓公將來能即位當國。《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⁴⁵《左傳》解釋《春秋經》元年春不書隱公即位的原因是「攝也」，並特別補敘了隱、桓嫡庶之由來，以說明「隱公立而奉之」，突出隱公雖行國君之政，實則意在奉桓公為君。事實上，隱公在位十一年間，不僅時時牢記攝位之名分，而且處處遵循周禮之規定，捍衛周禮之尊嚴，如居攝不行即位之禮；父改葬不臨；母沒不赴；大夫眾父卒不與小斂等等。對於如棠觀魚的違禮行為，事後對曾經諫阻的臧伯伯深表痛悔，並「葬之加一等」⁴⁶，加一等級安葬僖伯。《左傳》將「讓」視為禮的核心要義：「讓，禮之主也。」⁴⁷孔子也主張禮讓治國，他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⁴⁸《左傳》中，禮作為「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的國紀朝綱，成為評判或裁定事件是非曲直的最重要標準，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⁴⁹「《左氏》善於禮。」⁵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⁵¹春秋亂世最大的特徵就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就是對周王朝禮制的僭越和破壞。孔子「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⁵²，否極泰來，以使每況愈下的亂世重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諧有序的「王道」社會。因此，《春秋》開篇，極力突顯隱公攝位之誠，禮讓之舉，改過之德，實在是欲在亂世泥淖中托舉一朵白蓮，樹立一道德標杆，尊王崇禮，補弊起廢，寓世一希望，予人以力量，此乃「始隱」之微義，「反正」之宗旨。這與孔子刪《書》始自《堯典》，述《易》效法天德，實乃異曲同工，旨意相類。

至此，孔子修《春秋》始自隱公元年，存在三個參考維度：一個是自無道之君周幽王開啟的父子兄弟相爭，二王並立，直至東遷後王權式微、號令不行的「周亡（無）王」橫向歷史維度；一個是魯隱公時期集中爆發的各諸侯國內亂不斷、相互征伐「二王並立」局面的縱向歷史維度，開啟春秋霸主角力中原的序幕。三是魯隱

44 黃銘、曾亦譯注：《春秋公羊傳》，頁 2。

45 徐正英、鄒皓譯注：《春秋穀梁傳》（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頁 2。

46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 1714。

47 見《左傳·襄公三十二年》，【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 1714。

48 【清】阮元校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里仁》，頁 2471。

49 韓兆琦譯注：《史記》，頁 7664。

50 【唐】楊士勳：《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頁 2358。

5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曲禮》，頁 1473。

52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頁 1705。

公攝國謙讓，在亂世之中豎起一個遵守禮法的標竿，這是個虛設的道統禮法維度。這猶如一個歷史坐標系，天下無王的歷時坐標、政出諸侯的共時坐標，與魯隱公攝國謙讓的道統坐標，都在魯隱公時期交織匯集，形成突出的歷史轉捩點。「《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修《春秋》，意欲「撥亂世反之正」，「以當一王之法」，既要「采善貶惡」，據史直書，以史官的實錄精神真實地再現一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天下無道」亂世，又要以為王者師、為民立命的勇氣和擔當傳承文王、周公所開創的禮樂文化傳統，希冀端本正始，尊王重禮，重塑尊卑有序的和諧社會秩序。因此孔子興於魯，修《春秋》，始於隱公，於勢於理，皆當然耳。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對《春秋》的性質做了很多精闢的討論，唯獨對《春秋》為何始於隱公元年不贊一詞。孔子志在《春秋》，借史寓義，寄託了其綱紀人倫、重整乾坤的最高理想，影響中國文明思想二千餘年。儒家尤重開宗明義、見微知著，因此，《春秋》始於隱公，有大義存焉，應該予以高度重視。